

我們的道路

弗兰克·哈代等著



我 們 的 道 路

(澳)弗兰克·哈代等著

李 名 玉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Frank Hardy 等著

The Tracks We Travel

本書根據 Australasian Book Society, Melbourne,

1953 年版本譯出

我 們 的 道 路

原 著 者 〔澳〕弗兰克·哈代等

翻 譯 者 李 名 玉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精 1/32 印张：4 7/8 字数：89,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册

统一書号：10078·1085

定价：(九) 0.44 元

內容提要

这个短篇小說集是从澳大利亚短篇小說選集我們的道路中選譯的，共收十六篇富于現實意義、生動有趣的短篇。

在這裡，讀者能看到各種不同的題材，如失業、罢工、反對種族歧視、反對戰爭、房荒等。通過這些不同的題材，作者反映了澳大利亚人民如何熱愛和平與自由，如何反對壓迫和剝削。

這些短篇小說的內容是豐富的、筆法是新穎的，能使我們了解澳大利亚人民近几十年來的生活和鬥爭。

目 次

来日方长	1
韓先生	10
碼头附近	25
比目魚	37
漂来的木材	41
叩門者	53
一車木柴	68
星期六的电影	76
星期天下午	81
克拉蓋死了	87
轉變	92
叫我却利	115
我看見一个象別爾的人	120
五百发枪彈	125
生活是美好的	131
下一号	139
譯后記	145

长方日来

琳达尔·海陶

“二十項罪行每項判你三年徒刑。”

二十乘三等于六十，六十年，这等于是无期徒刑！

我現在二十五岁，是昆士兰法院被告席里帶着鍊铐的十三个罪犯中最年輕的一个。我还太年轻，不應該現在就去尝一輩子鐵窗风味，太年轻，不應該現在就发现自己已經不能从这法庭走到洛克汉姆登街，騎上我的馬，在引导我到这儿來的小道上騎回家去。那是条从新南威尔斯北部亨特河起的漫长的的道路；我是不是永远不能在那條路上騎了馬走呢？

我还記得那条道路的起点，就是我度过童年的故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时，我父亲从一个专种甘蔗和香蕉的退伍中校那里买了这块产业，这是一块很肥沃的河岸地。

这位中校雇用暂时出獄的犯人給他耕种，有一个名叫老約谷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还在那里。

就是老約谷，他給我講了关于替我們餐室遮蔭的那棵树的故事。

據說那位中校坐着吃早餐的時候，从开着的窗戶可以

看到这棵树，并且可以听到可怜的佃工們遭受工头处罚时的哀号声。約谷說：这种情景可以使他主人的食欲大大增加。

約谷是一个安静的、热爱劳动、身材矮小的人，誰愿意去鞭打他或者他的弟兄們呢？

天空是一片蓝色，浮云白得象温柔的小羊身上的毛；蟋蟀愉快地叫着；各种动物在树林里玩；熊在細嚼橡胶树叶；約谷替中校工作着，但中校鞭打他。这是殘忍而不公平的……那时我才六岁。

哑巴也是这样。他的母亲，据約谷告訴我，是一个三十年代时曾在田地上工作过的囚犯。她生哑巴的那天，正是她被綁在树上挨鞭打的一天。

哑巴是中校田上一个工头的儿子、可怜的傻头傻脑的家伙，他虽然不会說話，但他是个很有用的工人。

当我很小的时候，他整天和我在一起。

我們俩一起去偷蜂房里的蜂蜜；一起划我們家自造的小船；我們去找蚕茧；我們到鮑特田野去掘土。在夹竹桃下面，我們掘出套着鏈条的尸骨。这些鏈条使我幼小的心灵都会憤懣。人为什么象狗那样带上鎖鏈？

虽然哑巴是个成年人，但我父亲对待他，象对待种植园周围所有的幼稚动物一样，不論是小孩、狗或哑巴都是一样。

我父亲是个六呎高的有紅胡須的苏格兰人，他常常取笑我們；对我们大声叫喊，罵我們；用拳头打我們；他給我們

吃給我們住；有時他還為我們祈禱；有時他可能又打我們，不論小孩、狗或啞巴，但總是为了要我們好，从来不是因为我們弱小他才无情地打我們的。

我很小就知道，在我父親的哲學里，強權并不是公理。

因此，当我遇到那个来自美国的爱尔兰人时，我的心被他故事中的不公平激动了，并且打算接受他的教育。

記得那天是个节日，在河的下游舉行的一个烤牛肉聚会上，那个爱尔兰人告訴我，他为什么到澳洲来。

匹茲堡鋼鐵工业的情况不好，工人們发动了罢工。那共和国里掌握法律大权的人們，抓住了一点点虛构的証據就把罢工的領袖关起来。在那强權即公理的地方，无期徒刑是很普通的判决；而他就是一个从美国逃出来的被通緝的罢工領袖。

在联欢会結束乘船回家的途中，他听着几个邻居在爭論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問題。这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話題，因为有些美国人到了澳大利亚。我还記得他的話：

“無謂的爭論，朋友們。国家实行哪一种政体，难道說会对一个工人有利嗎？两种都有不平等的地方。我們这些只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产品出卖的人，不論我們生活在一个王国或一个共和国，資本家愿意給我們什么我們就得拿什么……如果資本家不付給我們公平合理的报酬，我們就联合起来向他要……”

响起了一片不同意的呼声：

“可是我們不是工人啊！”

“我們耕种自己的田地！”

“这家伙一定是个社会主义者！”

“說不定是个反动分子。”

我父亲对我說：“唉，孩子，別把世界上的煩惱堆在你的肩膀上！”

可是我覺得那个美国人的話有道理，我就同他交談起來。他借書給我看，这是肥沃土地上的第一批種籽。

后来，我在悉尼所看到的不平等現象使我进一步的思索。

几乎絕望了的人們，毫无目的地聚在庇得街，他們說他們挨餓，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們也挨餓；可是國內的糧食却很多。

我想起我們河区的黑土人卡米拉洛族，他們在季节不好的时候一起过苦日子，部落打猎收获多的时候，黑人公社里的人們大家一起享受。

当然白种人也能象黑人一样，組織公平的公社！

可是庇得街挨餓的人們垂头丧气地在討論“成立一个代表团”，“布置一次游行”，“采取其他措施”等等軟弱、徒然、无力的要求單純公平的办法。

我認為，他們所以挨餓是因為他們沒有組織起来，因為他們缺少一个領袖。

因此一八八八年，当我在巴柯河流域时，新組織起来的羊毛工人工会代表团拿了候选人名单来时，我就信奉了“工人们，联合起来”的信仰，成为會員之一。

一个只靠劳动力生活的人需要有一种新的信仰。

当时畜牧业的情况不能再坏，但它并不妨害我的生活，因为我很年轻；我才到一个新的省份；我的骑术很高明；我有很好的武器；食粮袋总是满满的；在陶森和巴柯一带经常有赶牛羊的工作或修理牧场的工作做。如果我把我的马掉过头来向南走——那么，我父亲的房子也很宽敞，他的田地上也总有工作给我做。

但是我看到别人没有我这样幸运；老年人给牧场主人干活累得半死；年轻的还不能体会自己的厄运。大家都被剥削了，大家都在等待一个领导者，希望他能指示他们怎样争取劳动应得的酬报。

因此我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我记得前一季度离开巴柯时的情况，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棚里正在上演匡同·孔那出戏，为医院募基金，我写了一首歌曲，其中一段合唱歌词是这样的：

在遥远的巴柯，
人们吃着杂碎、藜粥和野果。
高烧、疟疾和坏血病折磨着你，
还有巴柯腹疮，
可是最坏不过的是
倍利安多令人恶心的饮食。

倍利安多车站以恶劣的饮食著名，虽然坏的还不仅仅

是这一点。

又貴又坏的食品对牧場工人來說并不稀奇，如果我們不幸自己沒有帳篷，就得住宿在非常簡陋的地方。帆布擋不住昆士兰的风雨，这种地方，要是在我父亲住的享特河一帶，他甚至不愿意用来养馬。

但是老板們讓他們的工人象袋鼠在泥土里那样瘦弱死亡还不甘心，因为他們知道有許多工人可以給他們選擇。他們有一种可恶的脾气，不預先通知就临时解雇工人。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可怜的人，不管他們應該不應該，到处流浪，身边一文車資也沒有，他們走上几百哩路找一个工作的机会。工人当然應該在解雇前一星期接到通知和工資！

我記得几年前在巴尔卡亭地方，大約是一八八九年吧，听到一些新到澳洲来的人談話，他們乘奎特号輪船到昆士兰来的。

他們在海岸上走了几星期才算找到工作，凭一鎊一星期的工資去割牛蒡、清除有刺的野果。

他們做完了工作去領工錢时，什么也沒有領到，他們反而倒欠老板飯錢和住宿費。

“你們为什么要到澳洲来呢？”我問。

他們給我看一張布告，那种布告在英国乡村里貼了几百張：“欢迎移民到澳洲去！”我念着，“牛奶蜜糖之国——到那里去获得独立自由吧！不要别的，只要决心！”

政府移民局的官吏們了解，澳洲畜牧业大老板所需要的是：雇用大批低价劳动力，而不要負什么責任！

那天晚上在巴尔卡亭一家奥里莱酒店外面，一群羊毛工人来参加一个集会。从休安顿来的驛車脫了班，我們缺少一个演講的人。

“把那小伙子推到車子上去，”有人喊道，“那个有紅胡鬚的小伙子，”“就是那个給報紙写文章的，要是他能写，就一定能講”，“来吧，小伙子，我們支持你！”

因此我就站在旦尼·霍尔的羊毛車上，作第一次的公开演說。

好象砍倒一棵树那么容易，因为我的心在听了新到澳洲来的人那段故事后变得非常冷酷了。

“‘只要决心！’”我引用布告上的話，“牧場老板說：‘这是我干活的决心。’工人們說：‘这是大家組織起来的决心。’是的，同志們，”我对他們說，“这是組織一个联盟的决心，去向他們要求你們唯一商品——劳动力的合理代价的决心。”

此后我还作过許多報告，后来就在那一季我被选为他們的領袖之一；就是領導羊毛工人大罢工的十三个領袖之一；敢与老板們去談判的十三个代表之一；也就是現在站在洛克汉姆登法庭被告席里十三个囚犯之一。

这該是我的道路的末程。

在我們政府的眼光中，畜牧业老板的同业公会的强权比羊毛工人工会的公理有力，因此他們把一条如今在英國已經廢止的法律加在我們身上；他們用武力把我們弄到这里来。

推事哈定宣判完毕：“二十項罪行，每項判三年徒刑。”

六十年，这等于是无期徒刑！

国家检察官弯着身子在推事的耳朵里講了一句话。推事哈定年老龙鍾，剛才忘記了一句話：

“二十項處刑同时执行，”他不乐意地宣布說。

三年，只有三年！在我的紅胡鬚后面我对站在我旁边带着镣铐的斯密士·巴萊一笑。他也回笑了。对一个领导者的生命來說，三年并不算长。只有三年，然后我們又可以回到斗争里来了。

在两排武装警察的中間，我們朝监狱走去。

我們听到，在法院外面，我們的同志們在欢呼。

他們的呼声升到澳大利亚的天空，他們的呼声比那些卑鄙的镣铐叮当声更响亮。

這篇故事是根据作者的父亲，故事中的中心人物，裘林·斯都华特所記載的事实而写的。他就是一八九一年洛克汉姆登发生的不名誉的“阴谋”中，被公审的十三个工会领袖之一。威廉·兰恩亲眼看到这次公审，他写道：“这次公审的判决，不管它怎样，关系不大。在这里，就象任何时候社会的对抗因素面对面时、人道主义遇到拥护或打击时那样，整个社会，包括罪犯、牧場老板、法官、陪审官、律师在

● 一入九〇年八月开始的大罢工，到一八九一年一月进入第二个时期，那时昆士兰的剪羊毛工人举行了罢工，反对牧羊场形式的合同，但他們遭到了失败。

內，都受了一次审判。

“在这次公审中，形式上好象是那些牧农被审判了，他們除了在那广大的旁听席里的人外，沒有朋友，而在旁听席中，牧場老板却找不到朋友，只不过当时的旁听席不起作用罢了。”

韓先生

弗列克斯莫尔·赫森

我的父亲常常这样說他：“嘿！我看他一点也不象一个教师，倒象一个典型的德国农民。”但是这种侮蔑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到过德国，正同他沒有得过美容比賽奖一样。

当我为我的老师辩护时，我的父亲就会嗤嗤鼻子說：“他还喝酒，喝得如魚飲水一样；你在他臉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常常打量着韓先生的臉，我从来也沒有看到他臉上有一点酒容。固然他的臉很紅，尤其是他的鼻子，但是我的丽雅姑母的臉也很紅，而她总是怪消化不良。我想，“也許韓先生也有消化不良的毛病吧。”

况且，他时常跟我們講戒酒的道理，劝我們永远不要碰酒这样东西；有时他講到有些青年为了嗜酒而毁灭自己光明前途的悲慘故事时，眼泪会涌到他的眼睛里。“沒有一个愛喝酒的人会这样真誠地宣傳酒的害处。”

“何况他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人。”

我的父亲，因为是一个浸礼会教徒，相信我們大家應該謙虛，但是我始終不明白，为什么聪明人要裝得象傻瓜模

样。在十一岁时，我就怀疑他在性格分析上的研究，因为我們家里所發生的經濟困难，往往是由于他相信合股朋友的外貌所致的；那些朋友非但不象他們外表所表現的應該属于坦率真誠的“神經类型”，却非常不幸地突然轉变为令人莫測的阴險的“神經类型”了。

有一天，韓先生一句很隨便的話使我相信我們家里那些皮裝書籍里面有許多无稽之談。克立斯·馬龍和我放晚學后站在他的桌子跟前。

“你現在怎么不跟克立斯玩啦？”他問。

“因为我父亲說，脚趾象鴿爪的人不老实；他的一本很厚的書里面这样說的。”

韓先生的臉變得更紅了，他咕咕噥噥地說：

“好吧，无论哪个写这种……这种廢話，他的脑子准跟……跟跑狗場的狗一样！”

我想，就在这件事之后，我父亲看到了他和一个德国农民之間的討厭的相似之处。

我并没有把韓先生的外表放在心上。縱然他的肩膀很坦，在他帶我們做早操时大肚子一起一伏，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还是喜欢他。

他是一個高个子、很結實的人，他有淡金色的头发，兩鬢已呈灰色。胡鬚的顏色比較深些，特別是蓋到嘴唇的那部分，我們学生常常把它叫作“濾湯篩”。他有一个习惯：幻想的时候，常常啜他的須梢。他一双很藍的眼睛平时是很溫柔的，可是有时它們会象阳光射到鋼片上那样发光。他

的手很大，看上去不很灵敏；当我回忆他的手时，我就想到一只六个月大的紅猎犬不能自主的爪子。他的动作緩慢，他的沉重的步伐，同我許多年后看到一个农民走过一片休耕田的步子完全一样。

他的性情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教师都富于同情心；这使我很安心很舒适，因为我好几次被硬插到許多新学校，是个相当敏感的孩子。我并不是說他是一个感覺迟鈍的人；不，不，完全不是这样！他最不能容忍卑鄙的行为，他很容易感动得淌眼泪。但是在他的憤怒或兴奋的下面，始終帶着堅定和仁慈的因素；我現在想起来，这就是他善良本質的牢固的基础。

当时他在我眼中已經是相当老了，实际上他或許还不過五十五岁。他已经結过婚，據說他有一个儿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談起过他的家庭。

我認為在他那个学校里的一年是我童年中最有意义的时期。我愈长大，愈深深地遺憾，我从来没有感謝过他所給我的一切。

他沒有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在一个实验小学里，他是不会出风头的；他也并不是这样一个教师，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一点可怜的提升，长年到头穷凶极恶地唆使六十个学生爭取助学金，而实际上这种助学金在六十人中間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他和其他教师一样，完全不能激发我細心研究算术平方根和复名数計算的兴趣。

他常常是不公平的，例如他对大高个儿霍夫有成見，他